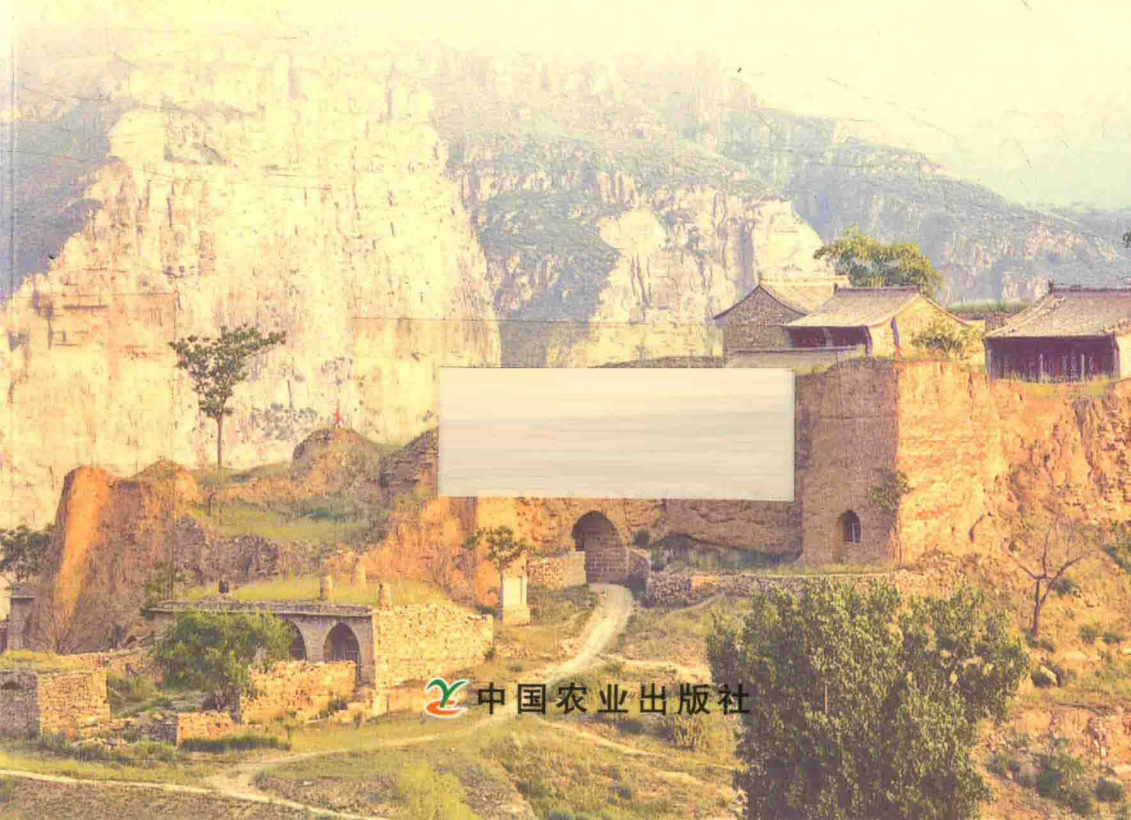




On Change of Rural Household's Behaviour in Shanxi

山西农家行为变迁： 1986—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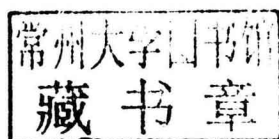
彭小辉 王玉琴 史清华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山西农家行为变迁：1986—2012

彭小辉 王玉琴 史清华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西农家行为变迁: 1986—2012 / 彭小辉, 王玉琴, 史清华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109-23445-1

I. ①山… II. ①彭… ②王… ③史… III. ①农业史—山西—1986—2012 IV. ①F3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5827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姚 红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32.25

字数: 566 千字

定价: 60.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项研究得到以下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农户创业行为与融资约束 (71273172)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福利问题研究 (71473165)

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转移与村庄秩序问题研究 (71773076)

土地、户籍制度协同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模拟分析 (71473163)

中国农村金融失灵市场的内在根源及福利影响研究 (71273171)

中国农村贫困成分的识别、分解及其改变的路径研究 (7167318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结构转换与升级路径问题研究 (14CJY082)

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15JZD026)

本书出版得到支持与资助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山西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顾海英工作室

谨以此书献给

忠厚朴实的三晋农家

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

山西农村固定观察点卅周年华诞

《华村一家丛书》总序

华 村 一 家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由山河湖海分割的地球似乎一下子变了个样，无论是东西的黑夜与白昼，还是南北的酷暑与严寒，自然的区分与障碍似乎都已被科技进步所穿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村庄时代，人们形象地称这个时代为“地球村时代”。

在这个地球村中，居住在东部的华夏人，在上天赋予的极为有限的生存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文明。尽管在整个五千余年文明史中，他们时有分合，但渴望统一的华夏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从而找到了彼此交流与沟通的“语言桥梁”。在“车同轨，书同文”的规制下华夏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华大家庭：中国。生活在这个大家庭的华夏人普遍认同“天下华人是一家”，这已成为生长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生命中所固有的特征。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先生的一曲《我的中国心》把全球华人聚合在一起，好似全球一家。从此每逢此节，不论身处何处，华夏儿女都会回到这个家庭，从而形成非常有特色的“华村一家”。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华夏文明已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变，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依旧在传承，在发扬光大。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强力推进过程中，城乡融合，“华村一家”，特色尽显。

团 队 形 成

作为“华村一家”的子民，我们有义务也有必要对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行为进行研究。由此我们成立了“华村一家”研究团队。结合所学与自身能力，我们团队执著于研究华村人家的传统行为及其演变，这一行为可以用三

个“传统”来概括：传统居处行为，传统就业行为与传统身份地位。我们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在那时，作为团队的领头人，我还是一名大学在校学生，但受所学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影响，在学习期间就开始了农家访问。在那时，我们的访问不叫访问，而叫实习。四年本科，到农家实习累计半年以上。尽管自己成长于农家，但真正对中国北方农家有所了解还是通过这些实习。大学毕业后尽管直升研究生了，但专业依旧未变，到农家访问的次数越来越多，访问涉及的区域也越来越广，从农家得到的见识也越来越丰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完成正是基于对宁夏银川郊区农家访问的结果。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研究所工作，最初一年即是作为山西省省委农村工作队队员到基层农村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有了学生时代的实习经历，对这一年的“三同”工作自感信心十足。我所在的村隶属的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经过一户户访问了解以及与村干部协商，结合我的工作单位山西农科院之优势，我们采用更新农作物品种策略，实施了农作物产量“倍增计划”。实施之初遇到了重重困难，其中最困难的是村民缺少购买良种的资金，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采用物物兑换的方式，实现了当家品种的全部更新，当年该村的玉米、大豆以及次年的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均实现了倍增。朴实的屯留县余吾镇河头村人，对我们的努力给予了“丰厚”的回报：对我们这些他们心目中的“公家人”给予了最好的招待。我们一天一家到各户轮着吃饭时，尽管各家的饭菜不同，有的丰盛，有的简单，但对于每一户农家来说，他们都拿出了自家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都是在用心敬着我们。从他们眼神中，我看到了什么是庄稼人的质朴，庄稼人期望的“公家人”是什么样，党的富民政策应当定位在何处，公家人应如何把党的富民政策贯彻到庄稼人心里。

有了学生期间的农家实习，有了工作头年的“三同”生活，便深感研究中国“传统与变迁”意义重大。所以在接下来的20年“三农”问题研究与教学工作中，着力打造“华村一家”团队就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团队的建设构想起源于20世纪末我在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业的完成，博士论文的选题即是《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真正开始建设则是我进浙江大学做博士后的事。尽管那时的我还只是浙江大学一名准工作人员，但在开明教授黄祖辉先生的支持下，临时组团开展的中国农户研究事业已初露端倪。2001年博士后出站正式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团队建设就成为此时的我之当务之急。我深知团队建设的核心是人，可在研究所工作多年的我，只是对研究所的团队建

设比较了解。研究所的团队建设有相对固定的人员组合,而大学则不同,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其研究团队的建设除了有相对固定的几名合作者外,更多的是来来去去的学生。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如一座兵营,有铁打的江山,但没有铁打的兵,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学风建设。正是基于此认识,“华村一家”团队从最初组团开始就狠抓学风,以兴趣培养为核心,以能力考核为手段,以事业进取为目标,着力打造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

自2002年组团以来,团队在我的带领下,以上海交通大学强大的经济管理学科做后盾,以做强做精为目标,通过自身在国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优势与人脉,与学科组顾海英教授、于冷教授一道合作,于2003年年底以跨越式的思维完成了“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培养点的成功申报。2004年正式开始了交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博士生招生与培养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团队建设正式进入了一个里程碑时代。鉴于我们的业绩,“华村一家”研究团队于2012年荣获上海交通大学首届“十佳科研团队”称号。

团 队 绩 效

人才培养与绩效 截至2016年年底,“华村一家”团队牵头人史清华教授已培养硕士研究生17名、博士研究生8名,目前在校硕博研究生4名。总体上看,团队的研究生培养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业绩非常突出。

在已毕业的博士中,程名望同学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开了两个先河,一是率先在国内经济管理顶尖期刊《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二是率先代表交通大学文科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徐翠萍同学不仅在国内经济管理顶尖刊物《管理世界》和农业经济管理顶尖刊物《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论文,更在国际农业经济领域顶尖刊物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SCI&SCI) 发表论文,与此同时,挟其师兄之势,在2013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的同时,于同年再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为交通大学农经学科在上海站稳脚跟,在全国崭露头角再立新功。晋洪涛同学同样在国内顶尖经济管理刊物《管理世界》和《中国农村经济》发文。俞宁同学在国际经济学顶尖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SSCI)、*Economics Letters* (SSCI)、*Economic Theory* (SS-

CI)、*Economic Theory Bulletin* (SSCI)、*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SSCI) 连续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是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首个在国际经济学顶尖刊物发文的博士研究生,且发表的级别一次次在提升。盖庆恩同学在师兄师姐的带动下再创辉煌,先后在《管理世界》《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发文四篇。其博士论文于2016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为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在上海滩的地位提升再立一功,同时也是“华村一家”团队三获此荣。随后毕业的彭小辉和袁方同学在校期间也都有不错的表现,在《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公共管理学报》和《中国软科学》等级别不错的杂志上发文数篇,特别是袁方同学,一名硕博连读生,在进入交通大学第二年即在《管理世界》上崭露头角。彭小辉同学也有不错的表现,在《管理世界》《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软科学》上发文三篇。

他们的业绩突出不只表现在论文发表上,还表现在项目研究与成果获奖上。在项目申报方面,毕业的博士中有四位在校期间获得各类项目资助。程名望、徐翠萍、晋洪涛等三位获得上海市科委博士生论文研究资助,徐翠萍和晋洪涛两位获得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养基金资助;晋洪涛和彭小辉两位在校期间还以在职身份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U120470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CGL048和14CJY082)三项。袁方同学协助导师先后成功申报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3165和71673186)两项。在成果获奖方面,程名望同学的博士论文除了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外(2008),在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2012),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其在《经济研究》(2006)发表一文还于2008年获国内农业经济学科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论文)奖”(别名“杜润生奖”),与我等合作完成的专著《长三角农家行为变迁:1986—2005》(上海三联书店,2007)于200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程名望、徐翠萍与我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农业新政策变化的政策效应》(《中国人口科学》,2007)于2008年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徐翠萍同学的博士论文获上海市优秀论文(2013),获国家百优论文提名(2013);晋洪涛同学的博士论文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后(2013),获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特等奖(2014);晋洪

涛、卓建伟与我合作完成的论文《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上海7村调查》（《管理世界》，2011）于2012年获得上海市邓小平理论与宣传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盖庆恩、朱喜和我合作完成的论文《要素配置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研究》，2011）于2012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有程名望、徐翠萍、张跃华、晋洪涛、俞宁等参与完成的《中国农家行为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一书于2011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作品工程奖，2013年获第六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16年获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晋洪涛等与我合作完成的《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先是得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支持，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系列，之后于2014年分别获第六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著作类）提名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彭小辉、张锐与我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田野调查》于2016年获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宣传优秀成果二等奖，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第七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类）提名奖。此外，有晋洪涛同学等参与的数项成果还获得上海市决策咨询一、二、三等奖数个。综上可见，团队的发展一方面在打造成员的研究能力，同时也在不断展示他们的研究实力。

与已毕业研究生相比，在校博士生虽然业绩相对有限，但他们的发展潜力已有显著体现：张锐同学不仅在《管理世界》（2014）发文，在国际SSCI期刊 *Energy Policy*（2014）*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5）相继发文。刘彬彬同学的一篇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模型与实证》的习作也被《管理世界》录用，即将发表。方聪龙、高晶晶等同学在博研期间也写出了质地不错工作论文，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团队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通过良好学风建设，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通过团队协作和有序分工，使得整个团队规模不断壮大，实力得到明显增强，创新与发展能力呈大幅提升态势。

项目申报与绩效 一个团队的形成与持续发展，需要有源源不断的项目支撑。“华村一家”团队正是得力于国家两大基金的持续支持才得以良好健康发展。从团队组建以来，“华村一家”团队先后申请并获批项目40余

项，在这些项目中，国家两大基金项目是核心（累计 27 项），也是支持团队稳步发展的基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 项，其中面上项目 15 项（史清华主持：70173016、70673065、71073102、71273171、71473165；朱喜主持：70703023、71273172、71473163；张跃华主持：70873102、71373228；程名望主持：71173156、71373179、71673200；卓建伟主持：71673186；盖庆恩主持：71673156），应急项目 4 项（70141022、70341009、70941027、71141022），人才项目 1 项（U1204707），国际合作 1 项（70710001），地区项目 2 项（周波主持：71063010 和 71263023）。国家社科基金 4 项，其中一般项目 1 项，艺术专项 1 项，青年项目 2 项。教育部重大项目 1 项（程名望主持：15JZD026）除上述国家基金项目之外，还有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博士点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项目若干。

团队在前进过程中，不只重视项目的申报，更重视项目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论文、专著以及研究报告的形式不断向社会公布。团队组建以来，先后出版专著 10 余部，在国内顶尖经济管理类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经济研究》与《管理世界》发表 20 余篇，《中国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问题》30 余篇。论著的转载引用与获奖频度也非常突出，先后有 10 数篇（部）获得不同层次的优秀奖，其中 5 部（篇）分别于 2008 年获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大奖（杜润生奖）和 2014 年和 2016 年获杜润生奖提名奖，两部专著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2 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部专著分别于 2011 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和 2016 年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两部专著于 2001 年和 2014 年分别获浙江省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部专著分别于 2004 年获浙江省和 2014 年获上海市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部专著于 2008 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随着团队研究水平的提高，论文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2010—2016 年连续有 16 篇 SSCI&SCI 类高档论文发表。由团队负责人主持的数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基金委后评估中均被评为“优”。团队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艺术专项也被评为“优秀”，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得到社会认可的同时，还得到政府的认可，有 10 数个成果被政府授予科技进步奖与决策咨询奖，一个成果（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千

村万户调查报告, 2012) 得到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的直接批复, 并于 2014 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内部探讨) 优秀成果奖。显然, 团队的做精做强目标已初步得到实现。

团队发展与经验 如果说团队在经历 10 数年能有这一进步, 一个重要原因是团队发展的基础工作做的比较扎实。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民行为, 对拥有庞大群体的不同层面的农民行为数据的积累就成为团队实现不断超越自我的一个重要法宝。尽管我们的起家是靠国家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观察数据支持, 但实现我们不断超越之梦想的却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日积月累的农民行为田野调查数据。从 2002 年开始, 团队就非常注重田野调查, 每年要花大量时间与金钱用于田野调查, 学生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充分锻炼, 对研究对象有了一个充分了解。截至 2016 年, 团队累计已获得农家样本数据 10 余万份, 我们的论著与成果形成很大程度是依托这些调查数据。当然, 拥有丰富的一手资料是实现成果创新的基础, 但别样的人才培养制度才是提升成果上档次的根本。团队的人才培养思路是: 因人而异, 有教无类。在人才培养与项目完成之间, 团队优先人才培养。通过学生兴趣的发掘, 顺着他们的兴趣找到支撑其发展的研究方向, 然后全力支持学生们的发展。尽管这样做可能会耽搁项目的完成, 但也正因为有此担心, 我们的项目申请思路也相应做了调整, 申请的项目实质是已完成的成果。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项目成果的质量, 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实践也肯定了团队的这一做法(项目研究成果质量与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双高)。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 使学生们在团队做研究的压力大大减弱, 而研究兴趣则相反大大增强, 由此研究成果呈现一种不断提升的状态。

当然, 一个研究团队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它存在的环境, “华村一家”研究团队的存在与发展也一样。它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得益于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良好的研究氛围, 其次得益于精诚团结的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三农”组合(学界形象地将研究农村问题见长的顾海英教授、研究农业标准化问题见长的于冷教授与研究农民问题见长的史清华教授称为“安泰三农”)。如果说研究团队的话, 我们仅是小团队一个, 真正的交通大学农经研究团队应是“安泰三农”团队。第三得益于两个重要兄弟单位浙江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的农经学科组的支持与提携, 为提升我们交通大学农经学科的发展水平, 由南农的钟甫宁教授、浙大的黄祖辉教授与交大的

顾海英教授等协商，共同发起并持续健康运行了长达 14 年的“长三角研究生三农论坛”（2003—2016）。作为这一论坛交大方的领队，我持续参与并见证了论坛的发展与我们学生的成长，深深感知论坛对交大“安泰三农”团队以及“华村一家”团队的影响与价值。“华村一家”团队的强劲发展说到底是一个天地人和的发展。这里的“天”指的是国家对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地”指的是学校与学院两级对我们“三农”组合的支持与“三农”组合的精诚合作以及长三角两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人”指的是团队特色的人才培养思路与学生的努力进取，三者缺一不可。

品 牌 确 立

随着团队的发展，我们日益感觉到确立一个品牌非常有必要。尽管我们的产品类型多样，有学生、有论文、有专著，还有研究报告，用一个品牌向外推介有难处，但对于专著则便于收集，方便读者查询。因此，我们于 2013 年决定将团队成员的专著以“华村一家”的品牌进行出版。目前本团队用此品牌已出版专著 4 部，加上以往出版的累计已达 16 部。对于已出版的专著，我们将名录附后，供读者查询与参考。



原稿写于上海市闵行区好第坊

2013 年 2 月 22 日

四次修订稿完于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2017 年 5 月 17 日

序

——理解农民

一次到上海交通大学开会，史清华教授托我给他们团队即将出版的书写几句。由于喜欢他一口山西音不拐弯、不修饰地讲农民问题，没有问他要出的是什么书，就满口答应了。拿到书稿后，就大呼“被装进去了！”一本名曰《山西农家行为变迁 1986—2012》，利用山西 1986—2012 年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农民变迁的扎扎实实的专著。固定观察点我了解，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至今硕果仅存的宝藏，杜老^①当年为观察和了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而建，后来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如今已成为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最系统、最具连续性的微观数据之一。史清华教授及其团队是利用这套数据产出最丰硕的学者之一。摆在面前的这本书，你不一页页看、一图一表地品，还真无从下笔。

中国的农村研究，经历过改革时代的改天换地与辉煌腾达，也陷入过所谓“三农”问题时期的看上去高度重视，实则地位尴尬。近些年除了每年体现重视的 1 号文件发布后几天的媒体解读，进城人回乡后因良心震撼写下的泛滥的“乡愁”体文字，对于这一回报很低的行当，真正基于一线的观察与研究已经很少，而将一线调查与数据分析结合起来的就更加凤毛麟角了。史清华和他的团队可谓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小众”。这个以“天下华人是一家”之意组建的“华村一家”研究团队，践行于研究农民的行为及其演变。他们基于农村一线调查和权威数据分析，历经 15 年的努力，可谓收获满满。这家人已搬回去的基金项目、发表的论文、获得的荣誉在此不表，真正让我这个刚入高校的新人羡慕不已的，一是培养出一个在研究态度与风格上具有传承性的团队，一个个“华村一家”的成员在交大安泰接受洗礼，再赴任各大高校，还继续以家人身份展开合作，产出发

① 这里指杜润生先生，时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表于顶尖学术期刊的作品。二是通过积累庞大的农民行为数据形成团队核心竞争优势。他们依靠国家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数据起家，又通过不懈的田野调查扩充数据资源，其建立的田野数据与真实世界的对应，避免了单纯以数据“试”假设的游戏。史清华教授及其“华村一家”团队的这一做法值得研习。

在听一些“三农”专家放词时，最难的是，你分辨不出他所表达的到底有多少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有多少是基于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陈述，有多少是他自己想象的，有多少是他有意以农民之口为他代言的，又有多少是他在为农民代言。每次听得云里雾里，只好回来找老家的人聊，了解“我最熟悉的那些农民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所为”。史清华团队的这份研究免了我这份劳神，一则他们几个就是山西人，对家乡的感觉不会有因陌生产生的感知偏差；二则他们是基于老家农民的记账数据。有了这两点，《山西农家行为变迁：1986—2012》的价值就在那里了。

农民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性命题，“恰亚诺夫小农”与“舒尔茨小农”之争，对农民的分析陷入对立的两个极端。以我对农民的理解，农民的行为是以其面对的约束条件及其改变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他有时表现为“生存性的”，有时为“道德性的”，有时是“斤斤计较性的”，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书选取的研究时期非常重要。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经历了后包产到户阶段人地关系的松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变化、农民的离土出村和代际差异以及公共政策校正城乡关系的努力。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研究农民行为及其变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基于山西在中国地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代表性，以其微观农户数据来呈现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是有较强代表性的。

本书的贡献，就是基于详实的数据，给出了处于历史转折期中国农民的一些典型性事实，拜这个团队辛勤的数据整理与分析所赐，提炼出如下一些印象最深的特征。

1. 人地关系的松动

人地关系是观察中国农民的主线。在过去的27年间，山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户均农地规模减少了14.23%，经营农地的农户比率下降了9.02个百分点。农户之间的农地规模有所分化，但不改小

规模格局，2012年时的家庭耕地规模平均7.34亩^①，人均仅2.10亩，9亩以下农户仅比1986年增加7.69个百分点，12~22.5亩农户还减少了17.92个百分点，22.5亩及以上规模农户略增0.05个百分点。有意义的是，耕地细碎化有所改进，农户经营地块数由1986年的7.58块降到2012年的3.82块。农地流转近几年有加快之势，有转包收入农户由2003年的4.55%上升至2012年的11.50%。

2. 粮食农业重要性的下降

长期以来，粮食既是国家的政治，也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这些年在微观主体那里变化了。农户作物播种面积由1986年的11.05亩降到2012年的6.17亩，粮食种植向玉米集中，玉米种植份额由1993年的23.41%增加到2003年的50.86%。粮作劳动投入降至30%左右，粮作收入占农户经济总收入的比重由1986年的30.64%降至2012年的12.42%。农户家庭人均粮食年末结存由1995年的235.67千克增加到2012年的304.53千克，农户粮食自产份额由1995年的89.84%降至2012年的86.75%。1986年粮作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50%以上的农户占总观察户的26.71%，到2012年时下降至11.12%。

3. 不可逆的离土出村

好消息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辛苦程度减低了，农民全年平均就业时间由2003年的171.71天降至2012年的152.25天。最具历史性的变化是农民的出村，2003—2012年，劳动力在村务农时间由52.04%降至31.89%，外出就业时间由33.98%上升至49.39%。外出劳动力由27.30%上升至32.14%，外出就业收入由26.05元/日上升至82.80元/日。劳动力出村以县内为主69.98%，县外23.14%，不过流向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县内占比由2003年的75.84%降至2012年的61.92%，县外占比由2003年的占比18.83%升至2012年的31.39个百分点。

4. 与收入回报关系密切的人力资本

总体而言，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25年，仅初中以下水平。人力资本投资似乎是农户摆脱低收入陷阱的一个途径，1986年时低于收入平均水平的全是文盲、半文盲户，接着扩大到小学及以下农户，上过初、

^① 15亩=1公顷。

高中的农户到2012年时分别比平均水平高出13.37和20.98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户的人均收入1986年时比文盲、半文盲户高25.61%，到2012年时高出66.82%。农业的低回报使该领域的人力资本状况进一步恶化，1986—201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户主文盲、半文盲率由6.35%升至11.96%，小学文化程度从36.30%升至46.85%，初中和高中占比分别由45.40%、11.96%降至36.85%和4.35%。

5. 波动的收入增长

农户人均收入由1986年的409.57元增至2012年的9 997.40元，年均增速达13.08%，但是，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4.31倍。农户收入增长也极不稳定，1986—1990年平均增长2.9%，1990—1995年略升至3.01%，1995—2000年降至2.01%，2000—2005年出现一个两位数的增长（15.85%），2005—2006年又降至11.72%，2010年后达到18.43%的高位。2010年的农户收入中，家庭经营占57.38%，打工收入占38.12%，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仅4.52%。

6. 农户的高度分化

无论是理论假定还是公共政策，农户往往被假定为均质的，事实上，被冠之以小农的中国农民这些年已高度分化。在1986年时，人均纯收入不足1 000元的农户占40.42%，人均纯收入在5 000元及以上的仅占1.11%；到1995年时，不足1 000元的农户降至26.54%，在5 000元及以上的微升至1.80%；2005年时，不足1 000元的农户占比为9.38%，在5 000元及以上的农户占比达到了18.43%；到2012年，不足1 000元的农户占比降至0.85%，在5 000元及以上的达到62.19%。按收入五等分下的欧希码指数变化，1986年时的欧指为6.44倍，1990年上升至7.18倍，1991年达到8.20倍，1997年更是达到9.03倍，2001年达到了9.49倍，2009年又达到9.59倍，2012年时两极农户的收入差距才缩小至6.71倍。收入两极农户的消费水平差距为116.54元，相对差距（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为1.36倍。到2010年，绝对差距扩大到4 310.51元，到2012年，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为2.74倍。

7. 随用途变化的资产

总体而言，农户的资产是显著增加。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由1987年的不足千元增长到2012年的万元以上。但是，随着生产方式转变，“役